

# 新时期反贫困研究新进展\*

## ——“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综述

檀学文<sup>1,3</sup> 东梅<sup>2</sup> 欧阳鑫<sup>3</sup> 余德劲<sup>2</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减贫成效显著，但各地区减贫进展差距较大。与此同时，面向联合国 2030 年消除全球极端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反贫困理论研究仍显滞后。为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反贫困理论创新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主办，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部发展研究院）和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承办的“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19 日在宁夏银川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巴西、南非、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卢旺达等国家以及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机构或大学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各界代表、青年学者、研究生等参会人员超过 600 人。

本次会议聚焦“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反贫困理论创新”，共邀请七位学者做主旨报告。对于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斯坦福大学罗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分别发表题为“夯实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中国的“共同富裕”始于 0 至 3 岁”和“中国脱贫地区政策和转型方向”的报告。然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深陷贫困泥潭，针对这些地区如何实现减贫和发展，北京大学林毅夫和世界银行卢安然分别发表题为“结构变迁与减贫：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和“世界贫困演变和世界银行的思路”的报告。实际上，贫困并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私人物品”，复旦大学万广华在题为“反贫困的异地社会经济效应：以跨省犯罪为例”的报告中，指出了贫困和贫困治理的外部性问题。另外，贫困分析不能固守传统经济指标，约翰内斯堡大学帕特里克·邦德在题为“无形财富时代的贫困与不平等：气候、自然资源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报告中提示要重视各类无形财富因素。

主旨演讲结束后，会议设置了“反贫困理论”“贫困治理”“减贫机制与效应”“减贫韧性与内生动力”“减贫理论解释”“减贫政策分析”六个平行论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和《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支持下，经严格匿名评审，会议从 100 余篇中英文投稿论文中筛选出 36 篇论文参加平行论坛交流。

\*本文通讯作者：欧阳鑫。

本次会议的研讨议题，不仅呈现了对反贫困理论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还从全球以及相关国家层面对反贫困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如何消除全球极端贫困进行战略探索，也对中国如何从内生发展角度深入推进脱贫成果的巩固拓展进行了具体分析。与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观点，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 一、反贫困理论研究视野的扩展

消除贫困和降低不平等有助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提高人类生活福祉，如何实现减贫和发展是人们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本次会议围绕贫困与不平等议题，邀请了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领域的资深学者发表演讲。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如何实现作为减贫基础的经济增长而不只是强调经济增长为何重要，从分配角度看如何形成反贫困和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在反贫困理论中如何系统性审视经济指标之外的无形财富因素，这些都大大扩展了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视野。

### （一）实现作为减贫基础的经济增长

随着贫困理论逐渐成熟、减贫经验愈加丰富，人们对贫困治理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例如贫困的减少依赖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援助等。本次会议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减贫战略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对减贫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益贫性或包容性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基础，这是众多反贫困理论的共识。魏后凯、卢安然等都强调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成功减贫的基础。林毅夫指出，贫困代表没有财富和资本，贫困人群获取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就业输出劳动，而就业机会则来自产业发展。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曾概括经济体迅速发展的五大特征，包括经济开放、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高投资、市场经济以及有为政府（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要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出，为促进逐利的企业家正确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进行两方面制度安排：一是有效市场，即市场要形成能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准确价格信号，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利润空间；二是有为政府，即政府要对先行企业的“试错行为”进行激励补偿，并配套产业发展所需的软的制度安排和硬的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必须考虑各地方不同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以及地方特殊性，思考地区比较优势是什么，然后选择产业，最后在政府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地区的竞争优势。林毅夫认为，完成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的目标需要世界人民加倍努力，只要思路对了，“没有贫困的世界”仍有可能实现。

### （二）完善反贫困和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

关于收入分配在减贫中的作用，一般都关注政府的财政支出或者社会支出以及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帕特里克·邦德认为，一般来说，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居民的社会支出也趋于增加，这有利于减贫和降低不平等。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支出水平不算高，但由于有很好的政策引导而产生了良好的减贫效应；而南非的社会支出水平虽然在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并不低，但是考虑到其他隐性因素后其实际有效支出水平并不高，减贫效果有限。

卢安然研究认为，理论上，穷人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高于其贡献的税收，是财政体系中的净收入者；而富人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低于其贡献的税收，是财政体系中的净支出者。事实上，高收入国家富人缴纳的税收多，有更多的税收收入可用于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但低收入国家经济较差，税收少，为穷人提供转移支付的税收基础弱，而且穷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存在隐性的间接税，综合比较之下，低收入国家的穷人也可能是财政体系中的净支出者。因此，累进税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税收制度设计。

高培勇将财政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提出反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要依靠制度建设，特别是基础性制度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这“两个规范”定位于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制度，意味着着眼于反贫困和共同富裕的中国制度建设，步入了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两大领域兼容、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两种调节并重的新征程，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现实考量，具有历史性、标志性意义。从现行税收征管机制的基本特征来看，中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机制存在主征间接税、主征企业法人税、主征现金流税三方面典型特征。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中国难以产生征收直接税、居民个人税和财产存量税的强烈需求。因此，要从去除间接税崇拜起步，推进反贫困、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中国迫切需要向现代税收征管机制转换，转换的基本方向在于：由主征间接税拓展至间接税与直接税相兼容；由主征企业法人税拓展至企业法人税和居民个人税相兼容；由主征现金流税拓展至流量税与存量税相兼容。中国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困难不在于税制结构的安排，而在于税收征管机制建设及相关主体能力建设上，这是两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三）审视反贫困理论中的无形因素

多数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和减贫成果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等“有形”的统计指标来体现，但这样往往将“无形”因素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忽略了自然资源、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灾害、生物多样性、大流行病、公共支出质量和结构等无形因素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斯蒂格里茨等人关于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测量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类似问题（Stiglitz et al., 2009）。帕特里克·邦德进一步认为，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气候灾害、非法活动猖獗、贫富差距加大、多边机构和国际合作失灵等无形的社会和生态问题给贫困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而这些问题处于经济统计范围之外，对它们的理论分析通常是零散的。他提出可用“无形财富”作为统括性视角进行理论创新，正确认识社会和生态的特殊价值，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而促进减少贫困和降低不平等。综合来看，本次研讨会上涉及反贫困和共同富裕的无形因素至少有以下三个突出的方面。

一是重视影响贫困的非传统因素。World Bank（2020）提出了“3C”概念，即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冲突（conflict）和新冠疫情（COVID-19）。帕特里克·邦德提出，资源过度利用、环境破坏等不当的人类活动即使发生在局部地区，也能通过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带来整体性的全球影响。生态移民如果实施良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类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适应能力（正如在宁夏所看到的）；但是如果移民是非自愿的，政策执行缺乏规范和监督，将可能造成“气候难民”。巴西学者莱拉·博约斯在其发言中也提到了这点。不仅如此，贫困与气候变化、气候灾害、资源枯竭、社会冲突等因素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例如，万广华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贫困和跨省犯罪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贫困会同时导致本省犯罪率和跨省犯罪率上升，而且由贫困

带来的跨省犯罪效应是本省犯罪的6倍。此外，针对如何降低犯罪率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扶贫比加强警力的作用更大。因此，扶贫对降低犯罪率的作用强于加强警力。各国（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反贫困行动具有正外部性，携手消除全球贫困有助于保护自身利益。

二是现有社会支出的结构存在不合理。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南非基于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77，考虑到税收和转移支付因素后，南非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59，因此南非是一个再分配力度很大的国家。但是，根据帕特里克·邦德的研究，考虑到更多的细节因素后，这个结论并不正确（Bond, 2016）。首先，社会支出不只是面向个人的社会福利，还存在所谓的“公司福利”，而公司福利通常有利于富人；其次，企业经常存在避税、利润返还、腐败等问题，而企业更多代表富人意志。例如，有数据显示，南非和中国的政府腐败并不严重，但是它们的公司腐败却十分严重。再次，社会支出（国家服务）不仅要考虑规模和成本，还要注意其质量和人群覆盖差异。例如，南非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已经“放弃了国家服务”，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倾向于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其原因就在于公共医疗和教育的质量很差。最后，社会制度中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扩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一般认为穷人从公共财政系统中获益更多而富人对其贡献更多。但是，World Bank（2023）指出，由于受税收基础和间接税等影响，低收入国家的穷人也是财政系统中的净贡献者。

三是教育对减贫和共同富裕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对减贫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界银行的减贫战略中被视为“第二支柱”。此次研讨会上提出了教育问题中常被忽视的一些因素。首先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教育质量差异问题，农村人口以及低收入人口的受教育质量可能更差，南非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是教育分阶段投资的效果差异及其累积性影响问题。对不同阶段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是人力资本领域的一个经典问题，一般认为对儿童早期教育的投资效益高于后期。美国学者罗斯高开展了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长期研究，他发现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尤以农村地区显著，这与中国在农村进行大规模教育投资的事实相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农村教育落后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家庭对婴幼儿良好和科学的养育行为缺失。养育行为的缺失使中国农村婴幼儿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情感能力发展滞后，而这又将产生长期影响，不利于他们后续教育和进入更高收入水平的工作行列。因此，社会要认识到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将干预儿童早期发展纳入相关政策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更多劳动力完成高中阶段教育，而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西南大学黄莉和李玲的研究与罗斯高的分析相呼应，她们基于调研数据从认知能力、社会情感能力、语言能力、运动能力刻画了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发现脱贫脆弱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较为滞后，精准扶贫政策并未有效促进脱贫脆弱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提升，但通过增加父母在陪伴子女上的时间可以提升儿童早期情感能力。

## 二、反贫困理论研究内容的深化

贫困研究领域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涵盖了贫困的含义、指标、测度、干预、评价等，为当前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规范。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

转变，学者不断推进贫困研究以捕捉新时期出现的新变量，贫困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丰富，这些进展在本次研讨会上也有一定的体现。

### （一）贫困识别与测度领域的研究深化

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单一维度到多维度的转变。2022年，世界银行按照2017年国际购买力平价指数，将国际贫困线从每人每天1.9美元上调到等值的每人每天2.15美元，对中低收入国家国际贫困线和中高收入国家国际贫困线也进行了相应的上调，而且世界银行也越来越倾向于同时使用多个贫困标准进行贫困状况评估。在绝对贫困标准之外，多维贫困标准以及多维相对贫困标准也都在已有研究中被大量使用。本次研讨会深化了对贫困识别与测度的研究，包括贫困瞄准效果的评价和因素性贫困分析等。

关于贫困瞄准效果，中国农业大学唐丽霞、陈枫和张一珂梳理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瞄准方式——基于福利测量的贫困瞄准和基于民众参与的贫困瞄准。然而，这些贫困瞄准方式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均有不足。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显示，多维和复合的评价方式是有效瞄准的有效途径，动态调整是有效瞄准的有力保障，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政府投入是有效瞄准的重要基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四川大学王卓和秦浩关注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瞄准效率问题。低保是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行城市低保存在错保和漏保等问题，瞄准效率低，且低保水平线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存在差距，低保制度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有限。他们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于行为能力理论，研究代理家计调查(proxy means tests, PMT)对城市低保瞄准偏误及其减贫效果的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实际低保瞄准机制，基于多维评价体系的代理家计调查能够显著降低错保率和漏保率，进而有助于提高低保制度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应。

单维贫困和多维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基于贫困属性的划分，它们有着不同的分析范式和识别标准，相关研究逐步趋于成熟。近年来，一些文献根据不同致贫因素在“贫困”前冠以不同前缀，进而形成了一系列因素性贫困的提法。例如：由能源匮乏或能源消费低于标准舒适性所需的理论水平导致的贫困称为“能源贫困”；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贫困称为“生态贫困”；由地理因素导致的空间集中性贫困称为“地理贫困”等。

青海民族大学耿强艳和胡西武的研究聚焦于“生态性空间贫困”。他们指出，中国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因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赋予生态功能，这些地区的资源利用权和发展机会受限，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以青海省为例，他们从人、产业、地理、生态四个维度构建了生态性空间贫困陷阱指标体系，借助统计年鉴和地理空间等数据分析了生态性空间贫困问题。研究发现，青海省生态性空间贫困陷阱指数处于较高水平，且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指数受人力资本、经济水平、发展机会、地形因素、社会保障等阻滞因素影响，同时受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万人大学生比重、路网密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平均储蓄存款、住户贷款余额增长幅度等障碍因子影响。

## （二）贫困驱动因素领域的研究深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数字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了传统经济场域限制，得到快速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等，为反贫困事业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女性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次研讨会中数字经济、女性赋权等作为新时期减贫或巩固脱贫成果的驱动因素被屡次提及。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时，学术界也催生了诸多关于数字经济对贫困影响的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王胜和李志国基于秦巴山区奉节县电商扶贫实践，探讨了电商如何对地区的“贫困锁定”进行“解锁”。从系统演化的视角，他们将中国扶贫进程划分为物质输入、能量输入和信息输入三个阶段。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锁定”困境，电商数字平台颠覆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系统内信息的编码、加工、传播、占有和利用等方式，并借助数字空间的匹配效应、协同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公平效应，实现信息主导下系统物质和能量输入的同向和匹配，从而彻底打破“致贫增强反馈回路”，推动系统全面脱贫。

西南大学石嘉懿基于2016—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数据，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拓宽正式就业渠道、扩大社会社交网络以及增加个体非农就业机会进而缓解相对贫困。数字经济的多业态和多层次就业需求，使得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人群均能匹配到合适岗位，有助于缩小就业机会差距，表现为数字技能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群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湖北经济学院张全红基于已有研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住户调查的农村样本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信贷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途径来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而且对脱贫户生计恢复力的提升幅度更大。

以往反贫困研究多以家庭为单位，然而，反贫困政策效果可能因资源或决策权配置的性别差异而有所不同。基于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NEWSS）数据，海南大学严凤鸣和许海平分析了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他们基于夫妻双方在日常家计支出、购买大件物品、投资、建房、借贷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决策权利分配，来衡量家庭妇女赋权情况，研究发现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儿童在教育、生活条件、健康、社会参与和外界保护上的多维贫困。

## （三）减贫政策效应评价的多维探讨

通常而言，对扶贫政策效果的评价从资源利用角度出发，即考察既定扶贫资源投入的产出情况，或者既定的扶贫效应（如农户增收）的资源投入情况，而且一般使用货币价值来衡量。但是，反贫困行动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农户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增收在内的多维福祉，因此扶贫效果评价需要超越收入维度。本次研讨会上一一些论文作者从幸福感角度分析了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

南开大学周云波、黄杏子和北京师范大学沈扬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 2010—2018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他们将 2015 年设为精准扶贫的政策冲击时点，以 2014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低于中国官方贫困标准（2014 年为每人每年 2800 元）作为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依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有助于提升贫困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观福利改进效应，除了传统的收入提升路径外，还来源于公平感的提升、安全感的提升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积极心态。

四川大学贺立龙和郭劲廷基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农户从“福利依赖”型生计策略转向“兼业经营”型生计策略的过程中，其主观幸福感有所提升。然而，以建档立卡为代表的扶贫干预政策却对上述过程具有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以建档立卡为代表的政策干预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农户收入，促使其年收入高于绝对贫困标准，进而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政治任务，而忽略了农户自身经营能力的提升。在农户生计由“福利依赖”和“务农主导”向“兼业经营”和“务工主导”优化方面，扶贫政策的刺激力度略显不足，长此以往，或将导致农户对政策优惠和相关福利的依赖，使其生计倾向固化，最终影响福利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的影响除了增收外，在主观效用、生计策略、阶层流动、代际贫困、平等与公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含义丰富，政策领域广泛，未来研究应注重将扶贫政策予以具化，开展更为细致的政策评估研究。

### 三、反贫困经验总结与战略探索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一项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然而，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逆转了此前全球减贫进程的积极趋势，导致 7100 多万人陷入贫困（World Bank, 2023）。此外，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博弈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这些都给国际减贫进程带来了严峻挑战。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减贫实践，并试图寻找推进全球减贫更加有效的战略。

#### （一）国际反贫困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国何以成功消除绝对贫困，需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作出充分解释以加深对其合理性的认识。本次研讨会上有多篇论文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中国农业大学李泽峰、左停、李世雄和赵泽宇从贫困治理视角，总结了中国在消除贫困过程中采取的具有原创性、独特性和普适性的措施，结合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分析了这些措施的应用条件和作用机制，提出宏观层面的整体性反贫困治理、中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实施和微观层面的农民资产与能力建设是中国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贡献。他们利用上述综合反贫困治理理论，对中国的反贫困实践重新归纳总结，更加立体和全面地解释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西南大学郑景露、徐亚东和张应良将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集体经济组织带入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资源流动、配置和协调为线索，为中国农村减贫成就构建了“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的理论解释框架。他们认为，中国减贫奇迹是有效市场、有能集体和有为政府功能

充分发挥的结果：有效市场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的优势，提高资源流动的主动性；有能集体发挥了组织有力、资源转化、利益分配的优势，加强资源汇聚的整合性；有为政府发挥了政策引导、扶贫资金补贴、统筹兼顾的制度优势，提高资源流动的强制性。

中国农业大学巴枫、左停等在综合反贫困治理框架下，对 25 个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进行了比较，从各国贫困定义和标准、减贫计划和减贫战略、减贫治理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减贫绩效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大多数国家主要通过货币形式定义贫困，即贫困表现为缺乏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需求（如营养、粮食安全、卫生、教育等）；多数国家的中长期减贫计划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减贫战略因国而异但核心原则相同，即一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支持小农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二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21 世纪以来，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减少极端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复旦大学郑宇和程文君回顾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减贫历程，认为中国在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和促进共同繁荣方面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战略，且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位列社会保护之上。而拉丁美洲国家在减贫方面的成功主要源于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减贫经验表明，实现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并没有“一刀切”的方案，需要各国根据自身特点和条件制定自己的减贫战略，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干中学”过程。巴西学者莱拉·比约斯陈述了巴西贫困治理现状和治理对策。她指出，由于种族歧视、市场排斥、环境恶劣等因素，巴西的贫困、被动移民状况都比统计数据更加严重，需要通过团结经济、粮食安全和营养计划等多种途径综合加以解决。

韩国学者左承喜和中国学者左学金构建了一个村庄竞争模型，认为村民、村级组织和政府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歧视原则（economic discrimination），进而帮助那些有竞争力的村庄实现更好的发展。他们以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新村运动为例，阐述村庄竞争模型在减贫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回顾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政策和经验。他们分析认为，中国和韩国都在权威政治模式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但在农村发展绩效上存在差异——韩国农村实现了共享和包容性发展，而中国农村发展相对迟缓。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和政策不利于村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经济歧视政策转向了经济平等主义，这不利于保持乡村经济活力。

## （二）消除全球极端贫困的战略探索

世界银行根据取得显著减贫成效国家的减贫经验，先后总结归纳了“两个半支柱”和“三支柱”战略。1990 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减贫“两个半支柱”战略——第一支柱是（劳动密集型）增长；第二支柱是包括健康和营养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最后半个支柱是社会救助，为老人和病人等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提供针对性的现金转移（World Bank, 1990）。2016 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为了实现 2030 年全球减贫目标，有必要建立“三支柱”战略，即将以前作为补充作用的社会救助支柱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保障支柱，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以应对经济、生态、健康等冲击（Gill et al., 2016）。

那么，“三支柱”战略是一个充分有效的消除贫困战略吗？从其提出以来全球减贫进展不同的结果来看显然未必，卢安然也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作为对高培勇的税收征管机制和帕特里克·邦



德的实际社会支出悖论的回应，以及基于对《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 2022》的理解，卢安然提出了反贫困战略“第四支柱”——财政政策，她认为该报告中提出的三项优先财政政策中，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优先财政政策均有利于促进原有“三支柱”战略的实现，有关累积税的优先财政政策则强调了以累进税方式动员反贫困资源的必要性。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檀学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欧阳鑫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反贫困战略的“第四支柱”，那就是基于中国减贫经验的专项反贫困行动。他们认为，“三支柱”战略在一些国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其经济增长无法启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三支柱”实际上是建立在以“有限政府”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内含了宏观经济自发成长、各支柱制度化运行、国家同质等前提条件，这在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适用。他们根据中国的减贫和发展经验，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建立“积极政府”，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积极作用，并开展专项反贫困行动。

从逻辑上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专项反贫困行动，新的“第四支柱”都对原有“三支柱”起到了补充作用。从实践来看，专项反贫困行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财政政策，范围更广。

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反贫困中应发挥“积极政府”作用这一观点，宁夏大学东梅和沈小诗提供了实证支持，中国农业大学臧雷振和盖建泽给出了案例支持。东梅和沈小诗基于全球 69 个发展中国家共 89 万户家庭数据，运用多层回归模型发现，一国或地区良好的政府治理不仅能降低贫困发生率、缓解贫困程度，还能减少贫困程度的地区差异。政府治理通过促进资源有效供给和有效分配发挥减贫效应，且尤在中等偏下经济体中明显。臧雷振和盖建泽以中国和坦桑尼亚政府资助的技术推广项目为例，说明了政府主导的适度技术推广有助于克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障碍，提升小农的脱贫效果。

#### 四、巩固拓展中国脱贫攻坚成果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反贫困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转向何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分化问题、群众脱贫不稳定及返贫问题等是近年来学者的研究热点。

##### （一）接续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

中国扶贫政策由早期的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不断转变，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魏后凯指出，中国的扶贫政策转型，一方面经历了从聚焦于区域逐渐向聚焦于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转变，另一方面则坚持和完善了区域扶贫开发政策，实现了区域政策和到户政策的有机结合。经过 40 多年的持续努力，中国在农村扶贫开发上取得了巨大成效，7.7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地区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中国对摆脱贫困的县设置了 5 年过渡期，以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魏后凯指出，中国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县域发展水平出现了分化。近年来，县域发展水平差异大，脱贫县和非贫困县均出现了分化的趋势。2020年，脱贫县中有25个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非贫困县中有61个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脱贫县的平均水平。在县域发展分化的情况下，原贫困地区不等于欠发达地区，而且原贫困地区政策的长期固化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因此，要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考虑低收入人口集聚和地区发展能力等，重新识别和划定欠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在财政、税收、金融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实施创新驱动行动，以期更好地缩小地区差距。

## （二）促进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反贫困研究的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到减少更广泛的贫困和提升更广泛的福祉方向，大量关注脱贫人口的脱贫质量和促进低收入人口发展的研究涌现，并出现了一系列热词：“返贫风险”“贫困脆弱性”“韧性”“恢复力”“发展动力”“内源发展”等。

“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前瞻性指标。重庆大学张鹏和兰宇使用2022年在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的农户调研数据，利用“贫困脆弱性”指标衡量农户返贫风险，发现样本地区农户返贫风险总体呈“橄榄形”分布，“脱贫不脱政策”总体上能降低农户返贫风险。南开大学姚万军和周欣雨研究发现，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上升将降低农业生产投资。

“韧性（resil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o”，最初的意思是反弹或跳回原始状态。在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背景下，衍生出了“减贫韧性”“经济韧性”“发展韧性”等相关表述。安徽财经大学胡联和盛迪将“农户减贫韧性”这一概念界定为面对各种风险和冲击，农户能够保持持续脱贫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们借用VEP（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以家庭福利水平高于某一标准的概率进行衡量，使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发现非农就业能提高农户的减贫韧性和发展韧性。

与“韧性”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恢复力”，二者均借用了动力学中的弹性思维，反映了事前状态下家庭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应对能力。湖北经济学院刘杰和张全红认为，生计恢复力表现为农户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等外部冲击时，能够对有限的资源禀赋进行最优策略选择，进而新的环境条件下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和实现生计可持续。他们以收入、资产、健康状况测度个体缓冲能力，以个人信誉和社交网络测度个体自组织能力，以受教育程度和外务工时间测度个体学习能力，并采用熵值法构建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的生计恢复力。

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是中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政策导向，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现农户增收的内在要求。湖南农业大学李飞、肖志芳、李欣玥和杨雯渊基于河北省阜平县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案例，探讨了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内涵及其提升途径。案例发现，促进妇女就业对提升妇女自我效能感、强化儿童人力资本培育、形成家庭和谐气氛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

新内源发展立足于本地但并不排斥外部因素，是一种以外生促内生的内外联动混合发展模式，因克服了单一的外源发展和内源发展的缺陷而受到众多学者青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冯辉、高天志和郑

少锋基于 2022 年梨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将新内源发展定位于同时满足资源在地化使用和收益在地化获得，并使用农户在梨果交易中获得买家数量多少的五级分类变量作为农民新内源发展的代理变量，发现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能够显著推动农民新内源发展。

## 五、结语

“反贫困理论创新”国际研讨会是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对反贫困理论研究和关注意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学术价值得到普遍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廖凡指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中国减贫经验、成就与国际合作以及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研究，举办了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减贫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研讨会，始终走在反贫困研究和国际交流前沿，本次会议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提出，期待通过充分的学术交流，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经验和成就的理论认识，对全球各地区减贫进程差距显著作出更具有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充分展现反贫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携手应对消除贫困这一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研究员等学者认为，中国反贫困理论总结滞后于实践，中国反贫困研究不仅要进一步做好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回应新时期的新问题，还要加快步入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视野的独立自主发展新阶段，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向新阶段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在与会学者共同努力下，本次研讨会扩展了反贫困研究的理论视野，也提出了反贫困战略新构想。经济增长是有效减贫的基础已经是常识，会上讨论更多的是如何实现包容的、有利于就业和减贫的经济增长。林毅夫重新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如何让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实现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卢安然和檀学文等也提出需要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收入分配在减贫中的作用首先体现为财政政策。收入分配的优劣不仅在于财政支出数量，还在于支出结构和质量，以及财政收入结构及其实现方式。高培勇讨论的税收征管问题揭示了建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基础性制度的必要性。帕特里克·邦德从无形财富视角指出了更多未被纳入考察视野的、影响减贫效果的生态和社会问题。基于对世界银行“三支柱”战略局限性的认识，卢安然和檀学文等分别提出了“第四支柱”的构想。尽管两者提出的“第四支柱”的角度不同，但这对于反思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何减贫失灵具有参考价值。魏后凯对反贫困政策的空间属性进行了归纳，根据县域发展水平分化状况，提出要重新识别欠发达地区并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

除此以外，本次研讨会还呈现探讨新问题、探索新理论、摸索新方法路径的“三新”学术交流特征。在问题设置上，本次研讨会除了讨论减贫成效、脱贫经验等传统问题，还大量涉及减贫韧性和恢复力，内生动力和内生发展，同时影响减贫和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无形财富因素、数字经济冲击、低收入或相对贫困性质等。在理论探索上，本次研讨会上提出了整体性或综合性反贫困治理、有能集体、贫困锁定和解锁、村庄竞争、第四支柱、政策执行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解释或假说，尽管有些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论证。在研究方法路径上，反贫困实证

研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本次研讨会中的一些研究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在近两年采集了最新的一手数据，一些研究采取了将多个来源数据进行宏观和微观匹配的方法，一些研究利用可得指标对内源发展、生计策略、生计恢复力等概念进行了量化尝试。

当然，研讨会成果也显示出当前反贫困研究面临滞后于实践发展、不能对新时期的实践需要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的双重困境。研究中的部分典型问题包括：对相对贫困或低收入的概念内核认识不清；精准扶贫中产生了海量数据但研究依然面临数据缺失窘境，导致不得不采取数据匹配、指标“移花接木”等间接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对“执行力”“开发式扶贫”等中国减贫中的独特因素缺乏有说服力的一般性提炼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研究能力不足、数据缺乏，另一方面是常规性的研究思路与中国综合性、递进式减贫实践与战略的整体性脱节。突破这种现状需要国家实施数据开放战略，需要学术界更多地采取综合性研究思路，通过深入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解决新概念的测量问题。

#### 参考文献

1. Bond, P., 2016, "Do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Really Reduce Inequality, or Do We Need More Thorough Measurements? A Response to the World Bank Researchers", <https://www.econ3x3.org/article/do-government-spending-and-taxation-really-reduce-inequality-or-do-we-need-more-thorough>.
2.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 158-161.
3. Zeballos, C., I. S. Gill, R. Ana, 2016, "Grow, Invest, Insure: A Game Plan to End Extreme Poverty by 2030". <https://hdl.handle.net/10986/25694>.
4. Stiglitz, J. E., A. Sen and J. P. Fitoussi,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miqol.s.org/howb/wp-content/uploads/2016/06/Stiglitz-Well-Being-Report-rapport\\_anglais.pdf](http://www.miqol.s.org/howb/wp-content/uploads/2016/06/Stiglitz-Well-Being-Report-rapport_anglais.pdf).
5. World Bank, 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6. World Bank, 2020,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https://hdl.handle.net/10986/34496>.
7. World Bank, 2023,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 Correcting Course",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

(作者单位：<sup>1</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sup>2</sup>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up>3</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尚友芳)